

第1卷第3期, 2008年9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2, Summer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1, No. 3, September, 2008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全球问题

- “开放获取”的利与弊.....1  
英语授课在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增长.....3  
面临危机的亚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5

## 学术职业

- 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7  
对欧洲科研人员学术生涯的反思.....9  
美国学术人力资源的危机.....11

## 拉美高等教育

- 存在拉美大学模式吗?.....13  
衡量阿根廷高校的质量: 细节决定成败.....15

## 东欧高等教育改革

- 黑山的教育改革: 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对弈.....17  
立陶宛的高等教育改革.....19

## 西欧高等教育进展

- 德国的“卓越计划”.....21  
欧盟的大学与社会凝聚力.....23

## 美国高等教育趋势

- 毛入学率、完学率、获得率: 美国的表现.....25  
高等教育政治经济中的营利性大学.....27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 知识经济: 新加坡的个案.....29  
肯尼亚的政治、种族与大学使命.....31

- 新书简介.....33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8  
电邮：[jihe@sjtu.edu.cn](mailto: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8  
Email: [jihe@sjtu.edu.cn](mailto: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 “开放获取”的利与弊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最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参加了“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敦促学院的教授将其研究结果公布在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网站上（也允许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稿到传统期刊上的教授选择不参加）。如此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通过在互联网上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免费提供给所有读者，就加入了不断壮大的批判传统期刊体系的队伍。开放获取运动最基本的信念是：知识应该免费提供给每个人，而互联网则为全世界人民便捷地获取知识提供了条件。这与对跨国出版公司日益增加的垄断和掠夺行为的深恶痛绝有关。

对哈佛大学来说，做出这一决定相对来讲没有任何代价。学校的声誉和许多教师的杰出地位将确保该网站对学者们具有吸引力，确保在网站上公布研究成果的学者不被忽视。同样地，麻省理工学院实施了开放课件项目（open courseware program），把学校大部分课程放在互联网上让所有人使用，这一举措被誉为对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也存在重大弊端。这一方式可能会很好地确保杰出的学者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学者的工作可能会更难被认可。开放获取确实能保证知识被平等地使用。这个方式通过将材料置于互联网上去参与全球信息的指数增长，但问题出在选择上，即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如何从海量的信息中选出最好且最相关的内容？

### 传统的体系

传统的学术期刊提供了一种筛选的方式。虽然同行审稿制度并不十分完美，但在审查研究内容、出版学术成果方面效果相当不错。期刊编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稿件的情况，权威专家则对这些稿件进行匿名评审，

如此以来，最富价值的论文便会被发表。这些期刊本身会被排名，习惯上以学科领域中非正式的亚文化为排名依据，最近则根据颇受争议的“影响因子”和其他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排名。

作为传统学术期刊体系一部分的新期刊，其创建旨在反映新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成果、学者和社会的需求以及近十多年来繁荣学术的跨学科趋势。其中一些期刊获得了声誉，而另外一些则没有什么影响。传统体系的关键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相当合理有效的同行审稿和筛选方式。在选取有价值的知识、决定最好应忽略的知识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很简单，有时是过于简单的方式。

### 失控的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学术期刊体系近年来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最严重的问题是该体系已被商业化。施普林格公司（Springer）和爱思维尔公司（Elsevier）等主要跨国出版商收购了许多已有的期刊，并大幅度提高刊物的定价。受影响最大的是生物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其他领域的期刊也受到了影响。这一趋势造成了期刊价格的剧涨，为学术型图书馆这一传统的期刊购买者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出版商和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营利性公司发行了许多新的期刊，部分原因在于满足不断扩大的知识库的需要，另一部分原因纯粹是为了创立更多的营利名目。此外，大的出版商们逐渐把旗下的期刊“捆绑”在一起，并要求图书馆通过电子网络购买大量期刊，期刊越多，价格便越高。造成上述情况的因素包括学术界本身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学者们为了获得晋升和更多的薪水而需要发表更多的论文。

由于强调日益重要的引文分析和影响因子的积极作用，学术问责运动有力地加强了

传统的期刊体系。虽然这些方法还非常不完善，往往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边缘体系的学术产出不利，却在充满竞争的学术体系中被广泛地用于学术职务的晋升、大学和院系的排名等。科研水平评估中极其依赖影响因子，比如英国的评估。为了在国际公认的期刊发表论文，中国、挪威、以色列等国家的大学向教授们提供奖励。值得注意的是，引文分析现在掌握在一些营利性公司手中。

期刊出版的商业化和过度扩张导致了开放获取运动的出现。学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管理人员认为他们在日益昂贵并逐渐形成垄断的期刊传统期刊体系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绕道而行。

### 存在的问题

开放获取也存在一些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少同行审稿，所有的知识都是变成平等的。目前的看法是“购买者自己留心”，但绝大部分顾客都缺乏做出明智选择的专业知识。互联网上没有质量控制，不论是维基百科的论文还是某一著名学者的论文。开放获取可能使那些已处于知识系统顶端者受益。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网站可能由于其世界一流的美名而吸引读者。而发展中国家某一所较不知名的学校有可能就不那么受关注，更不用说处于学生圈边缘的高校内毫无名气的学者所发表的论文。虽然传统的期刊也往往给予那些在顶尖大学工作的学者以特

权，但至少同行审稿制度为所有人提供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开放获取意味着没有衡量研究质量的客观方法，只有使用者自己对内容进行评估。如果传统的期刊和同行审稿制度不再发挥作用，那么学术评价将一片混乱。根据每篇论文被查阅的次数进行评价是可行的，但谷歌（Google）搜索的随机性非常有可能扭曲这些评价。研究者将没有评价学术论文质量的精确方法。

### 未来之路

旧的学术期刊体系虽然有缺陷，却很可能是学术交流的最佳方式。一些由学术界、大学或其他非营利性出版商发行的学术期刊起着筛选和同行评议的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非营利出版商，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及其缪斯项目（Project MUSE），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发行，刊物的价格并不是特别高。美国人类学研究学会最近决定把它们的期刊出租给一个营利性出版商，出版商已经提高了价格，这似乎是一个负面举动。毋庸置疑，知识的膨胀、互联网传播的日益复杂，对知识传播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开放获取虽然看起来是个简单易行的补救方法，但却存在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注：该文曾刊登于2008年6月5日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伦敦）上。

## 英语授课在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增长

Bernd Wächter

欧洲学术合作协会 (Acade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会长

电子邮箱: bernd.waechter@aca-secretariat.be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用的最新数据,2005年全世界共有留学生270万,而2000年和1975年的数字分别为180万和60万。留学生人数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还将迅速增加。各国已经开始对这些学生进行激烈地争夺,非英语国家在这一领域常处于不利地位。语言障碍是欧洲大陆国家约十年前开始引入英语授课的原因之一。2002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学术合作协会发布了对这一现象进行的首次实证研究。六年后,该组织又出版了题为《欧洲高等教育中的英语授课专业:2007年的情况》(English-Taught Programmes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The Picture in 2007)的后续研究(作者为Bernd Wachter和Friedhelm Maiworm,2008)。本文介绍的就是该书中的重要发现。

### 增长强劲、分布不均

这项研究对27个欧洲国家的2,200所英语为非授课母语的高校进行了调查,高校的问卷回收率为38%。在这些高校中,约有2,400个英语授课专业,比2002年调查的数据增长了3倍。尽管如此,英语授课在欧洲一般的专业教学中仍只占较小的份额。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英语授课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很不均衡。在被确定的所有专业中,近1/3由荷兰高校提供,荷兰在这方面是欧洲毫无争议的引领者。德国在专业的绝对数量上排名第2,但在比例上只处于中间水平。北欧国家都处在较高水平,而南欧的高校几乎不提供英语授课专业。从学校层面看,大部分英语授课专业由在校生规模较大、授予博士学位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提供,而非规模较小的学院。有趣的是,一所高校提供的英语授课专业数与该校的留学生数量之

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留学生比例较小的高校(尤其是在那些使用小语种的国家)把英语授课专业作为一种吸引留学生的手段,原因在于它们不能在用本国语言授课的专业中吸引足够的学生。

### 聚焦研究生教育

英语授课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占有主导地位,比例几乎达到4/5。在诸如德国、瑞典和瑞士等国家,英语授课专业在研究生专业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90%。自2002年研究生教育中英语授课专业达到68%以来,第二轮增长趋势已进一步加强。

在整个欧洲,最经常提供英语授课专业的学科领域是工程和技术学科(27%),其次是商学和管理学学科(24%),然后是社会科学(21%)。这三大学科领域提供的英语授课专业共占全部专业的72%。2002年商学和管理学的英语授课专业数比排在第2名的工学高一倍以上,社会科学只排第4名;此后,这种专业领域的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

欧洲的英语授课还处于初级阶段,因为它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调查中所发现的那些专业,大部分(51%)是四年前建立的,1/4以上甚至是最近两年才建立的,只有约1/5的专业是2000年前建立的。

就读英语授课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现在的比例接近2/3(65%),2002年调查时的比例是60%。本国学生占英语授课专业学生总数的35%,往往集中在本科学习阶段,占本科阶段接受英语授课学生总数的50%以上。留学生中,欧洲学生人数最多(36%),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学生(34%)。在国家层面,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接近10%),但是不同接收国的留学生来源国有很大的不同。

英语授课专业中 2/3 以上 (70%) 都是收学费的, 比 2002 年的比例高了很多。只有北欧国家 (芬兰、瑞典和挪威) 仍然几乎是“免费”的。在欧洲, 来自本国以及欧盟国家学生的费用平均为每年 3,400 欧元左右, 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留学生的费用约为 6,300 欧元。丹麦的费用最贵, 平均为 11,000 欧元。

### 语言的争论: 终于变成常态

英语授课专业的提供引发了一场虽然称不上是意识形态, 但是很激烈的争论, 尤其是在早些年。批评英语授课的人认为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因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缺乏对英语的掌握。

英语授课这个新趋势还被认为是对小语种的威胁, 将最终导致小语种不再作为科学表达的媒介。英语授课的捍卫者则承认尽管问题确实存在, 但并不像批评者所讲的那么严重。

2002 年的调查结果好像已经支持了捍卫者的观点, 目前的研究则更加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在被调查的学校中, 只有 16% 认为留学生没有充分地掌握英语, 只有 9% 认为本国学生对英语掌握不够。可能让人惊讶的是, 最常被提及的语言问题是担心留学生缺乏对其母语的掌握。虽然问题并没有改变, 但欧洲的高校已经习惯了在留学生课堂上用英语交流的现状, 曾经导致尴尬的状况如今被认为是正常的。

## 面临危机的亚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大部分人都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作为软科学 (soft sciences), 是任何一所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所真正的大学必须在这些领域具有实力。软科学不但本身就是重要的学科, 并且是所有通识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许多东亚国家的大学中,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处在危机之中, 社会科学程度稍轻些。目前很少有学生选择学习人文学科的专业, 如哲学、历史和文化研究。除了应用性的英语专业, 从事语言学和语言研究的人数也在下降。社会科学, 尤其是经济学以及小部分与管理或政策相关的学科, 情况好一些。最近, 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把东亚主要大学的领导者和哈佛大学的学者聚集在哈佛大学, 对东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危机”进行了讨论。

### 软科学的问题

许多大学正在急于通过着重发展硬科学和其他容易量化的学科来建成“世界一流”, 造成软科学失去了活力。正如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大学都更多地强调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的一面而非“公共收益”的一面一样, 大学和公共经费提供者普遍支持那些将带来收入或学生需求的学科领域。大学所发挥的传统公共产品的作用, 即提供各学科领域的教育、文化分析和批判、整合科学和文化、知识传承等, 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在了一边。学生发现自然科学的专业, 尤其是诸如管理和法律等专业, 能提供更具有安全性且报酬丰厚的职业, 这造成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数骤然减少。受过职业和自然科学培训的人, 更容易找到学术界之外的工作, 并且报酬更高; 甚至在学术界, 这些领域的工资水平也普遍较高。私立大学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在诸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主

导地位, 私立大学的兴起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强调学生需求量大的学科领域。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对软科学尤其具有破坏性。第一代的大学生通常选择毕业后容易就业的学科, 很少选择软科学领域的专业。大众化所造成的预算压力则意味着削减对学科需求不高领域的投入。

### 软科学与通识教育

就像全世界很多国家一样, 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大学都提供面向某个职业或学科的专业课程体系, 学生都必须进入相应的学院学习。虽然例外情况确实存在, 如东京大学要求学生接受一年的通识教育, 但总体上缺乏通识教育。最近东亚各国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这种专业课程体系, 批评者认为这种教育扼杀创造力, 迫使学生只关注自己学习的领域。此外, 这种专业课程体系可能不适合 21 世纪流动性更强的就业市场。

随着通识教育和交叉学科教育理念的加强,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通识教育从不提供纯粹以科学为基础的课程体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 软科学至少与硬科学和专业性的学科一样重要。随着软科学实力的不断下降, 发展具有创新性并能有效实施的通识教育即使有可能但也极其困难。

许多东亚大学关心的问题是把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培养作为学术课程的一部分。像通识教育一样, 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都必须涉及人文及社会科学。

### 现状

随着在校人数的下降和经费的削减, 人文学科的专业已逐渐减少甚至被取消。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以前重视软科学的私立大学正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在校人数正随着

人口下降而下降。具体表现在：大部分的软科学学科所培养的博士日益减少，这反映出学生的偏好；这些学科所能提供的学术职位也在减少；薪酬待遇跟不上其他学科；教授们年龄越来越大，而且往往后继无人。

与此同时，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即需要软科学支撑专业教育，并且人们日益关心软科学在培养第一学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

### 挑战

确保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适当的实力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学术机构和政府必须认识到软科学对大学来说非常重要，必须确保经费到位。能够培养顶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的高水平学术院系是基本的需要。并非每所大学都需要有能力培养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博士，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有这样的能力。在硬科学的一些学科中，科学家接受训练的地方无关紧要，但在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中，在本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大多数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国家的背景很重要，专家也不可能存在于海外。在国家与地方历史、民族文化和语言等相关学科，本土的研究和资料通常相当不错。在那些重视外国学位的学术体系中，这可能导致人文学科处于不利地位。

人文学科特别容易成为大学中被边缘

化、威信低的领域。软科学必须恢复其在学术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这些领域必须通过强调跨学科的学习、对通识教育的贡献以及在理解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重新融入大学的主流。诸如生物伦理学和环境科学等新的学科领域，如果要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专门知识。商学学科需要很强的社会科学知识，最好的商学研究包括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很多时候，人文学者乐于固守在自己狭窄的学科中，但他们必须让其他人明白其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如果通识教育和创造性思维要成为课程教育的一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是绝对必需的。

目前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关键挑战，包括：改善软科学在每所大学中的形象；提高一国在各种软科学领域中培养高水平学者的能力（当然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提供所有的学科专业）；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整合到职业教育及其他领域的跨学科教育中去；提高这些软科学的实力以为通识教育做贡献。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仅是大学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是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诠释着当今面临的关键挑战。大学作为仔细分析和诠释社会的关键机构，前所未有地需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 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

Ivón Pacheco, Laura E. Rumbley

Ivón Pacheco: 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博士生; 电子邮箱: pacheciv@bc.edu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 rumbley@bc.edu

调查全世界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就像在比较苹果、桔子、香蕉、草莓、猕猴桃、樱桃、李子等的价格……找到各个国家完整且可比的最新数据经常是一件极端艰巨的任务。考虑到各个国家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环境, 比较不同国家教师之间的工资待遇变得更加困难。

考察全世界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 可以揭示每个社会赋予学术事业以及大学教师的价值。这项研究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大学教师工资待遇的影响因素。同时, 还能获得目前急需的对人才外流以及人才回流现象的洞见。

已有一小部分研究尝试对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进行国际比较, 但是只有少数研究覆盖的地理范围较广、包括各种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内。2007年,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探索性项目, 尝试收集和比较(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系数统一转换为美元) 15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工资待遇资料, 分别为: 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美国以及巴勒斯坦。

### 工资待遇与国家发展程度

研究发现, 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从中国的1,182美元到加拿大的6,038美元不等。根据这些调查结果计算出的国际平均月薪为4,856美元, 加拿大教师的月薪平均是他们中国同行的5.1倍以上。

为了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 有必要把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与一些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在此, 我们根据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上的相对位置来做一个比较分析。不出所料, 那些“人类

发展”水平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跟水平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 平均工资待遇低一些。

尽管如此, 还是存在几个有趣的例外。比如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第61位的沙特阿拉伯, 其平均工资待遇一直超过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第3位的澳大利亚、第16位的英国、第8位的日本、第22位的德国以及第10位的法国。南非也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规律, 该国虽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第121位, 但其起始工资待遇的平均水平却高于第63位的马来西亚、第75位的哥伦比亚以及第81位的中国。更值得关注的是, 在最高水平工资待遇的平均水平方面, 南非的工资待遇高于被研究的15个国家中的10个,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与此同时,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平均工资待遇的国际比较中一直处在最后。

### 工资待遇增长的潜力

在职业生涯中工资待遇的增长情况方面, 我们的数据显示, 更加富裕且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师往往会享有更大的工资待遇增长潜力。尽管如此, 这里同样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南非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是起始工资待遇与最高水平工资待遇差距第3大的国家。因此, 南非的大学教师可以期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工资待遇的增长速度超过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英国、德国或者法国的同行。同时, 看看工资待遇随时间增长的情况, 甚至会发现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超过富裕的国家。中国、南非、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的工资待遇增长率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都超过100%。事实上, 资料显示, 中国的大学教师在从入职到获得最高职级的过程中, 工资待遇的增长潜力高达170%以上, 而德国和法国则分别在39%和32%上徘徊。

## 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与国家的平均工资待遇

对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与本国人均收入对比后可以发现, 大学教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情况都不错。例如, 印度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待遇比世界银行估计的该国月人均 GDP 收入高了 8.7 倍之多。南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平均分别比本国的人均 GDP 高 5.8 倍和 5.4 倍。相反, 很多发达国家, 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大学教师的收入仅仅是这些国家月人均 GDP 的 1.4 到 2.2 倍。

### 政策意义

上述结果突出了世界上较不发达和高度发达国家的不同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 至少在一些较不发达国家, 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与所在国的人均 GDP 收入相比并不是太差。尽管如此, 全球对人才的需求则意味着要想与海外就业机构竞争的话, 可能有必要提供更加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否则的话, 人才流失问题将会继续困扰许多已经在此苦苦挣扎的穷国。

同时, 虽然大学教师在“人类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所享受到的平均工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同行要高, 但我们的比较结果表明, 发达国家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比本国的人均 GDP 收入高多少。在平均主义分配文化

占主导的国家里, 这一趋势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当大学教师发现他们在经历多年的教育后只能赚取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平均工资待遇, 或者远低于其他专业人才(比如法律、医学或高科技领域)时, 这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难以留住精英人才。当然, 本研究并没有比较大学教师和其他职业的工资待遇, 显然还需要这方面的工作。

### 研究计划

对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分析, 需要更详实可靠的工资待遇数据以及应用金融、经济等方面的跨学科专业知识。同时, 如果能研制出一个测量大学教师购买力平价的工具, 可能是反映工资待遇与大学教师的需求、开支和生活方式之间联系的更恰当方法。该领域未来的研究需要讨论日益增多的兼职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现状; 必须比较不同学科领域的收入; 并且应该与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的工资待遇分别进行国内外对比。

### 结论

理解全世界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 既有价值也很有趣。大学及其高质量的教师在帮助国家获得并维持全球经济活动和计划方面的竞争地位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简单的事实, 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在任何有关国家发展的讨论以及国际竞争中, 都是微妙但重要的考虑因素。

## 对欧洲科研人员学术生涯的反思

Ulrich Teichler, Harald Schomburg

Ulrich Teichler: 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 电子邮箱: teichler@incher.uni-kassel.de

Harald Schomburg: 德国卡塞尔大学研究员; 电子邮箱: schomburg@incher.uni-kassel.de

在欧洲, 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和科研质量的提高被广泛地看作是应对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挑战所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 学者的成型期, 即从大学毕业到发展为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高级学者这一阶段, 在整个欧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 终身职业与否?

欧洲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毕业之后从事科研活动的年轻人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前还一直积极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比例。

从大学获得学位通常被认为是成为一名科研人员的入门资格。因此, 对大学毕业生的追踪研究, 能够提供在职业生涯第一阶段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比例信息。《接受高等教育后的职业生涯: 欧洲的情况》(Careers after Higher Education: A European Research Study), 对1994/95年从11个欧洲国家和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进行了毕业四年后的追踪调查, 提供了有关该主题目前为止最好的比较数据: 这12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中, 22%的学生继续深造; 28%的毕业生四年后是科研人员, 这一比例从23% (荷兰) 到37% (德国) 不等; 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毕业生中, 毕业四年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为59%。

德国小型人口普查(Microcensus)提供了有关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后期积极从事科研工作的数据: 在2004年, 35-39年龄段的比例为29%, 40-44年龄段为27%, 45-49年龄段为24%, 50-54年龄段为20%, 55-59年龄段为18%, 60-64年龄段仅有13%。而对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毕业生来说, 在35-39岁年龄段有53%的人积极从事科研工作, 但这一比例每年下降大约1%, 60-64年龄段仅为25%。因此, 这些数据揭示了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中, 科研人员所占比例呈

一种令人惊讶却有规律的下降趋势。

### 职业流动

人们认为科研人员的流动正呈快速上升趋势。通常用有关外国科研人员的数据来验证这一观点。事实上, 欧盟统计局(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的数据表明, 欧盟的科研人员中, 2000年有5.0%是外国人, 2005年这一比例仅上升到5.3%。以德国为例, 这一比例上升的幅度较大, 同一时期从5.1%上升到6.4%。

然而, 由于许多人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游走于全世界不同国家, 单单只有外国科研人员的数据就不那么有用了。《欧洲的数据: 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学生流动》(Maria Kelo, Ulrich Teichler, and Bernd Wächter, eds. Eurodata: Student Mobility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Bonn: Lemmons, 2006)一书比较了外国学生和国际流动学生(国际流动学生指就学前来接受教育或者就学前来定居的学生)的相关统计数据, 揭示了上述趋势。该研究发现, 以2003年为例, (1)在德国的高等教育中有8.5%的学生是前来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2)3.4%的学生是就学前已经在德国的外国学生; (3)1.5%的学生是回国学习的德国学生。

在英国, 这三组学生的流动数据要稍微高一点, 分别是13.0%、4.6%和0.6%。瑞士则更高, 分别达到14.1%、5.3%和2.0%。这些数据还不能揭示流动的总体情况, 需要通过追溯性分析来确定某一个特定时期内有多少人流动, 比如职业生涯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而且, 有关学生流动的数据比科研人员流动的数据详细。根据学生综合统计数据, 2003年在海外留学的德国学生占德国学生总数的3.5%。然而, 对即将毕业且在国内学习

的德国学生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有15%的人曾在外国学习过一段时间。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以下例子得到解释:一个四年中在外国学习了一年的学生,可能有一次作为外国学生注册,有三次作为本国学生注册。此外,很多国家的正规学生统计数据都不包括短期的国际流动学生。

2001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德国人中,约有10%的人会在随后的10年里在外国度过一段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最近几年已有所提高。

### 职业风险

大学里的科研工作竞争激烈。一般来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步入学术职业的年轻教师最终可以成为高级教师(一般是教授),其他大部分人都不会作为大学中的教师留下来。在很多欧洲国家,教师不但面临着成功率低的风险,而且必须在很多年的工作中都只有短期合同,而同一年龄段的其他专业人士大多已享有稳定的工作环境了。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展的一项有关学术职业的研究表明,各国年轻教师的雇佣情况和职业生涯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很多国家的情况都是大概40岁之前为短期雇佣,并且淘汰率很高。

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经常悲叹年轻学

者的境遇,声称美国年轻学者的雇佣条件要有利得多。例如,德国人预计,如果德国的雇佣条件不改善的话,人才会进一步外流到美国去。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德国年轻学者的工作环境与美国同行相比,并没有像公众所传说的那么不利。

在德国的大学中,绝大多数博士生都被自己所在的学校雇佣,至少是兼职的临时雇佣,他们比美国大学的博士生更有可能在学校或奖学金的帮助下获得博士学习的经费。在德国,从获得博士学位到荣登教授职位所需的时间(平均为8年,33-41岁)与在美国从博士到副教授所需的时间(多数是7年,33-40岁)相近。在德国的大学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中,超过30%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合同,而在美国,签订这种合同的副教授不到10%。在德国大学中,各个层次的薪资水平平均比美国大学略高。

另外,研究表明,德国大学的毕业生中,约有1/10的学生最后被授予博士学位;在这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中,约有1/10的人最终将成为教授。在美国情况也一样,大约100个毕业生中有1个能成为教授。但美国的选拔过程与德国不同:大约20个学生中有1个将被授予博士学位,而只有1/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将最终成为副教授或教授。

## 美国学术人力资源的危机

Philip G. Altbach, Martin J. Finkelstein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Martin J. Finkelstein: 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学教授

前纽约州州长艾略特·斯皮策 (Eliot Spitzer) 曾宣布为了提高纽约州的竞争力, 打算通过新增 2,000 名教师和创建一个 40 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来改善公立高等教育。《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的社论一致认为, 为了提高竞争力, 必须优先考虑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 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了 7.5%, 是十年内最大的增幅。发展知识经济的代价是很高的, 而高等教育是赢得胜利的关键。高校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和科学家, 开展能推动知识经济的研究, 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人力资源, 即教师。然而, 目前普遍认为美国的学术职业正处在“危急时刻”, 即日益恶化的情况中。这个问题部分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教授目前的平均年龄是 50 岁以上, 近 1/5 的人超过 60 岁。可能有一半的高校教师将在未来十年退休。在许多学科, 尤其是那些与科学和技术领域相关的学科, 没有足够的博士毕业生来填补退休教师的空缺或者新增的岗位。

另一个问题与报酬有关。一般来讲, 高校教师的工资无法与高等教育以外具有可比性的工作竞争。虽然最优秀最聪慧的人从来不是仅仅因为金钱而从事学术工作的, 但高校教师的工资必须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尽管顶尖大学的一小部分资深教授的工资达到六位数, 但教授的平均工资低于 7 万美元, 与刚毕业护士的薪资一样。顶尖大学尤其是享有声望的私立大学的工资, 比 80% 的美国学生所就读的公立高校的工资增长迅速得多。甚至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这样的高校都担心它们不能再与最好的私立大学竞争了。

许多专家对学术职业未来的吸引力感到

不安。部分担心包括合格的博士毕业生越来越少、博士生的辍学率高、获得学位的时间延长。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的“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职业合作项目 (Collaborative on Academic Careers in Higher Education)”发现, 在职业生涯早期进入学术队伍的教师存在着流失的风险, 与公立学校新教师、新护士出现的大量流失相似。

最大的危机或许是学术雇佣合约性质的巨大改变。以前, 大多数教师都处于全职的终身系列。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被聘为助理教授, 如果其表现足够出色, 通常就有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并被期望一直表现优秀。教师们的薪水相对较低, 但享有保障学术自由的终身教职。一个相当健全的就业市场保证大部分年轻的学者和科学家在完成长期而艰苦的博士学习后, 得到全职的终身教职。学术职业吸引了对教学以及对科研这类精神生活有兴趣的年轻人。

### 学术职业的恶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美国高校聘任的全职教师中, 终身教职系列的教师不到一半。在过去的 15 年, 大多数被雇用的全职教师都是签订年度或短期合同, 没有资格被终身聘用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2005 年占 57%)。事实上, 新一代教师中, 更多的人是被聘来讲授 1-2 门课程的兼职教师, 完全没有职业保障或福利。虽然某些类型的高校和学术领域面临更大的风险, 但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这一变化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刻但尚不清楚的影响。它意味着大量的教师缺乏与所在学校的密切联系或献身精神。他们不参与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教授治学, 也没有学术自由的保障。这些被

边缘化的教师不从事科研，与所教学生接触不多、对学生也不负责。在许多方面，他们就像拉丁美洲的“出租车教师”，来学校上完1或2门课后就离开。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全职教师，尤其是那些具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和指导学生、参加学校的决策并从事科研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上述变化导致了学术职业的萎缩。美国大学的教师队伍正在分化为两类：一类是一小部分工作负荷日益增加的全职精英教师队伍，另一类是大量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与学校关系很不密切的兼职教师队伍。初步研究表明，这种新形式可能会损害学生的学习经历、学术单位的运作以及国家研发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

## 未来

如果纽约州要成功地实现加强公立高等教育的目标，它必须首先意识到高校教师工作条件的恶化和雇用终身教职教师的重要性。如果目前的下降趋势继续，无论是额外拨款还是创设捐赠基金，都不可能改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的教授是高校中的宝石，但正在失去光泽。

作者注：该文曾刊登于《布法罗新闻报》(Buffalo News)。

## 存在拉美大学模式吗？

Andrés Bernasconi

智利安德雷斯·贝略大学（Universidad Andrés Bello）副校长

电子邮箱：abernasconi@unab.cl

在19世纪和近乎整个20世纪，拉美独立后的大学主要是在大学的拉美理念影响下发展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模式却受到了来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因素和相关外部挑战因素的共同冲击。因此，尽管这种传统大学范式中的某些因素仍然存在，但如今拉美大学的模式却主要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接近。

### 拉美大学模式的形成

纵观整个20世纪，拉美的大学要么是全新建的，要么由殖民地时期所遗存的大学重组而来，引领着拉美国家独立后的现代化建设。这些新大学培养世俗社会中的专业精英，特别是公务员。国家号召这些大学担任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助手，促进国家统一、提高国民素质。讲席教授主要由自由职业者中的知名人士兼职担任，分布在组织松散的专业学院中，常见的专业领域是法律、医学和工程。

1918年，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Cordoba）学生发起的大学改革运动是拉美地区最主要大学模式的转折点。这场改革运动的宗旨随着时间在不断发展，并在整个拉美地区传播。典型的信条包括民主管理或“共同管理”（cogovernance），由学生、教授和校友共同选举院长和校长，通过各种委员会进行集体决策；通过免费教育和扩大招生实现入学机会的民主化；把大学的使命导向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实现不受国家干涉的自治，维护学术自由。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拉美大学模式对本地区大学的影响达到了最高点。然而，由于社会转型、人口问题及中等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此时都在经历着转型。

### 对传统拉美大学模式的侵蚀

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的扩张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增加公立大学的数量，扩大在校生规模，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发展大规模的私立高等教育，如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同时发展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如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中非大学机构的出现，促进了高等教育在理念、功能和组织方面的多元化。

大众化、增长无序、教育质量下降、政治化以及高校对精英人才影响力降低等对公立大学的影响，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军事独裁、80年代经济危机和90年代政治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变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了公立大学的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危机，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恢复。

拉美已开展了科研活动，实现了长久以来的科研愿望，并出现了从事科研活动的全职科研人员。该地区也存在着全世界大学都面临的趋势：知识经济价值的增加、通过收取学费和提供服务解决经费自给的压力、私有化、科研人员和教师与企业更密切合作的要求、满足更多问责要求的方案制订，以及被批评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而被支持者称为“知识的资本化”的新系统。为了缓解目前的财政压力，符合由多边贷款机构（multilateral lending agencies）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学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与竞争力问题，而放弃传统拉美模式的社会转型特征。

### 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由于北美顶尖大学在科学产出和把握新

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方面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美国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支配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美国研究型大学以其对知识创新与应用的重视、院系设置、专业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教授治学、对科研和论文发表的组织与奖励,以及自治与问责之间的弹性平衡而著称于世。这种成功的模式极大地鼓舞着世界各地的大学领导者,并成为全世界大学的黄金标准。

具有海外研究生学位、对研究型大学有切身体会的新一代教师,要求解决院系设置、科研实验室、实验设备、资金及全职合同等问题。在这些新教师取代那些只进行教学的兼职专业人士或全职教授掌管学术单位后,他们把这些学术单位(或整个大学,如果这样的教师足够多)引向了研究型大学的文化。

事实上,根据拉美大学的产出,只有很少一部分学校可以被称为研究型大学;除了巴西之外,其他国家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均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即使研究型大学在拉美并不多,但它们却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已经适应本土文化的研究型大学模式。

### 传统拉美大学模式的遗迹

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仍然被拉美大学作为大学的主要功能,但是强调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本科教育中的“非专业化教育(deprofessionalization)”也比比皆是。

兼职教师仍然是大学教师的主体,但拥有博士学位、为学校全职工作的教师正日益

增多。新一代的教师具有管理特权,控制着学校,而由学生和行政人员参与的共同管理正在消退。

表明拉美大学模式没落的迹象很多,但是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大学所表现出的迹象不同。比如在巴西和智利,两国的大学模式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但中美洲地区或玻利维亚的大型国立大学却仍坚持着这种传统模式,而哥伦比亚却像巴西一样,从未吸收这种模式的很多影响。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新成立的或规模较小的大学比起那些知名度高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更容易摒弃传统的模式。

由于该地区最大的公立大学一直具有拉美传统模式中的某些因素,比如民主管理、免收学费、政治参与等,拉美大学的传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消失。进一步讲,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全球的其他地方,大学所具有的政治意识、社会批判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传统在现在看来仍然特别有意义。同其他文化扩散现象一样,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可能会在认可并整合拉美大学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2008年2月在《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52卷第1期上发表的“存在拉美大学模式吗?”一文的压缩版。



## 衡量阿根廷高校的质量：细节决定成败

Liz Reisberg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reisberg@bc.edu

国家质量保证项目已经实施十多年了，阿根廷或许正在错误的道路上从事着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没有考虑阿根廷高等教育的特殊情况，该国就采用了一个普遍通用的方案。用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阿根廷的大学正把注意力和资源从改善教学这一学校的主要功能上转移开。

### 背景和挑战

阿根廷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快速变化。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近几十年来剧增，政府已经允许私立高等教育大发展，同时也新建了公立大学。目前阿根廷有81所大学（43所私立，38所公立），2007年的在校生规模略高于150万，而25年前的在校生规模还不足40万。

阿根廷高等教育的扩张发生在经济条件非常不稳定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直至1991年才结束。经济短暂繁荣后，又在90年代经受了数次挫折，2001年比索贬值75%时情况最糟。

就在学生规模快速扩张时，公立大学挣扎在不断缩减的或贬值的预算中，刚发展的、靠学费生存的私立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此，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经费往往都严重紧缺。在面临这些重大经济挑战的同时，高等教育突然又不得不面对问责和质量保证的新要求。

### 模仿他国

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世界银行的评价和经费推动下，阿根廷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质量大讨论。国际专家应邀介绍了其他国家采用的方案。阿根廷的教育工作者也出国参加会议，详细了解

国际趋势和项目。1995年通过的一部新的高等教育法中，提出大学必须参加一系列评估。

在具体操作中，这个新计划类似于普遍采用的质量保证方案，即先是自我分析，然后是外部评估。所有的评估都由新成立的准政府协调委员会——国家大学评估与认证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y Acreditación Universitaria）进行。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但有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即评估到底衡量什么内容。换句话讲，用哪些指标来评价阿根廷的大学？

质量是一个不同于“成功”的概念，虽然每个人都想要质量，但是极少有人能够定义出适合不同人的质量概念。不根据阿根廷高等教育的独特特点来定义质量，可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由于缺乏建立本土标准的经验和过程，阿根廷采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衡量措施和方法。因此，正在衡量的内容包括：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授数、论文发表情况、科研产出、学生升级率（retention rates）以及管理效益。但阿根廷不是法国和西班牙，也不是美国，更不是智利。其他国家用来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措施对阿根廷的用处有多大？至关重要的是考虑阿根廷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若干关键特征。

传统和经济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衡量质量的国际标准对阿根廷来说不切实际，在短期内毫无意义。这一批判并不是意味着这些标准长期没用；唯一的问题在于阿根廷的评估不应该从这样的标准开始。目前使用国际标准的风险在于有限的资源将被重新分配，而更迫切（更相关的）的优先事务可能会被搁置在一边。举例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大学才开始提供极少的研究生教育项目。由于研究生学位一直都不是阿根廷大学教师所必备的条件，那么

仅有很少一部分教授具有研究生学位也不奇怪。经费困难使得大部分大学都选择雇用大量的兼职教师。根据文化和教育部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公立大学中的全职教师仅仅占12%。

阿根廷的大学几乎没有科研传统，如果有，过去也是由独立的研究机构进行的。此外，大量的兼职教师和对基础设施有限的经费投入，也限制了大学未来的研究能力。平均来讲，公立大学的毕业率不到24%，私立大学的比例略高（26%）。阿根廷没有为学生提供服务的传统，即学术咨询、职业生涯辅导、个人辅导或经济援助。

在阿根廷的大学中，高级管理人员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共同选举产生。新当选的官员任命自己的管理团队，抑制了具有专业管理经验的本校管理人员的发展。

### 建设具有阿根廷特点的衡量标准

考虑到当前的条件、预算和传统，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大学质量评价标准在阿根廷是行不通的。阿根廷大学所从事的（几乎完全）是教学。因此，衡量阿根廷大学质

量的主要标准难道不应该是教学吗？然而在模仿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教学几乎被完全忽视了。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实行学生评教的制度，但这个过程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去分析和利用所收集到的数据。而且，这只是提高教学的一小部分措施。

对阿根廷的大学来讲，难道稀少的资源不应该被集中用于促进教学卓越，而是被用于试图发展当前的环境所不能持续支撑的能力上吗？为教师提供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新技术和教学方法的机会，大学难道没有看到这样所立即产生的效益吗？

一连串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大学是多么不了解自己。自我评价的过程引发了对学生、教授和设备等数据的需求，促进了跟踪未来数据新系统的建设。当开始准确并诚实地评估目前的条件和现实时，才能最有效地提高质量。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应用这些数据，以及学校发展的重点将是什么——是关注普遍使用的评估标准，还是关注经过仔细考虑、服务于阿根廷高等教育需求和现实的评估过程。

## 黑山的教育改革：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对弈

Joseph Stetar, Vucina Zoric

Joseph Stetar: 美国西东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stetarjo@shu.edu

Vucina Zoric: 黑山大学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vucina@cg.ac.yu

作为曾经的南联盟 6 个共和国之一以及联合国的最新成员国（2006 年）之一，黑山正在进行高等教育的转型与结构重组。作为一个人口约 65 万的小国，黑山无力支撑复杂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目前仅有一所国立大学，即黑山大学。该校建于 1974 年，共有 19 个学院、在校生 14,000 人。黑山有两所私立大学，一所是建于 2005 年、有 1,000 名在校生的地中海大学（University of Mediterranean），另一所是建于 2007 年、有在校生 222 名和 2 个学院的 Univerzitates 大学。2007 年，这两所私立大学招收的新生占全国的 14%。

虽然私立高等教育最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国家激增，但其在作为欧盟核心的西欧国家的出现却缓和得多。为了表明黑山对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极大兴趣，该国的高等教育也倾向于模仿西欧的模式。在西欧，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只占全国大学生人数的很小一部分。然而，黑山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上与中欧及东南欧相连，而中欧和东南欧的私立大学在过去 15 年经历了明显的扩张，黑山的高等教育不免受其影响。

与前苏联很多共和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为公立教育提供足够的经费不同，黑山提供的经费支持力度很大。比如说，19.1% 的国家预算、5.7% 的 GDP 被用于教育。虽然直接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比例难以获得，但据估计比例是相当大的。然而，黑山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把公共资金用于促进或扶持私立高等教育的努力极少会得到支持。

### 国家政策

虽然政府试图保持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高度控制，但目前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主要针对国立大学，对私立高等教育几乎不关

注。开办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私立幼儿园和成人教育机构是合法的。归类为非政府组织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受国家控制，并且具有很重要的免税地位。然而，这些规定不适用于私立大学，因为相关法律对此没有界定。在法律真空被解决之前，期望私立高等教育进一步大规模扩张是非常困难的。财政经费、质量保证以及与国立大学争夺合格的教师，是国立大学、教育部和私立大学之间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国家通过禁止私立大学提供国立大学已有的教育项目来保护黑山大学，限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限制使得学生既无法在国立大学，也无法在任意一所私立大学中学习他们想学的专业，继而导致他们出国学习。在黑山，每年超过 25% 的大学适龄学生在临近国家（多为塞尔维亚）的公私立大学学习。

### 未来发展

黑山刚刚发展起来的私立高等教育受到了邻国私立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的许多观念和特性的伤害。国家的教育首先考虑国立大学，而私立大学由于文凭不太被认可、吸引不了优秀的学生、重经济效益轻质量等问题，通常被视为劣等教育机构。反过来讲，国立大学拥有自己的传统、相对更高的声誉以及精英教育理念，但也经常因为僵化、官僚、过度集权、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反应滞后而被诟病。然而，尽管教育部施加了种种限制，但私立教育系统还是能够发现并应对市场的需求。

在东欧其他国家，推动私立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包括宗教、文化与族群等，例如里沃夫（Lviv）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和基辅（Kiev）的所罗门大学，但这些因素在黑山几乎不起作用。作为一个拥有宗教冲突历史

的新兴世俗国家，黑山具有强烈的社会潜意识，惧怕私立的、以信仰为基石的大学会加剧宗教冲突。

黑山的高等教育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少数学生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大批学生到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在黑山的高等教

育中，国际交流与联系非常有限，需要大力发展。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对学术人员的争夺不利于合作的开展。由于资源有限，黑山应当鼓励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国家需求；而就在此时，黑山却深陷在不利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监管和保护主义的文化之中。

## 立陶宛的高等教育改革

Liudvika Leisyte

荷兰特文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 高等教育与政策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 l.leisyte@utwente.nl

根据1999年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而推行的博洛尼亚进程,促使欧洲各国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各个国家也往往把博洛尼亚进程作为本国改革合法化的依据。一些国家按照《博洛尼亚宣言》中提出的建议推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改革。然而,他们同时又极力避免对教育内容进行大幅度改变,即改革学士和硕士学位所要求修习的课程。因此,欧洲各国是有选择地服从博洛尼亚进程,其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某些领域可能仍旧保持原样。这种现象在那些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中欧与东欧国家中特别常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在利用博洛尼亚进程作为自己加入欧盟合法化的依据。

###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

立陶宛的高等教育改革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是政府和学术寡头集团(academic oligarchy)这两股强大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也包括加入欧盟,高等教育成了改革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立陶宛根据《博洛尼亚宣言》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相关的结构调整,包括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和质量保证体系等。在90年代初期,立陶宛借鉴美国模式创建了三级(学位)结构。然而,四年制学士和两年制硕士学位是在完全不改变培养计划和教学方法的情况下建立的。这样一来,新的学位结构既保持了立陶宛本国的特点,又带有国际的影响。尽管这场改革是从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域(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中获得的合法性,但并不是所有改革措施全都与博洛尼亚进程有关。

### 90年代改革的结果

尽管自苏联时代就开始的渐进式改革已走过了15个年头,立陶宛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停滞不前。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起政府就缺乏在高等教育方面推行重大改革的政治意愿,学术寡头依然保持着传统上的威望地位。由于具有近亲繁殖这一显著特点,立陶宛高等教育体系一方面缺乏校际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缺乏与国外大学展开合作的强烈意向。在立陶宛,为确保每所大学都能获得经费,大部分的经费分配都是通过大学同科学与教育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之间的谈判协商确定的,因此对学生和资源的竞争还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大学被指责为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象牙塔。而与此同时,学术寡头们却抱怨大学缺乏自治。根据学术寡头们的观点,大学的本科生招收数量由国家直接控制,同时还必须向国家阐明经费的支出情况。这些学者常常强调博洛尼亚进程中有关大学自治的建议。

### 里斯本目标

“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2001年由欧盟委员会提出,它主张促进欧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该战略得到了欧盟及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回应和支持。

然而,立陶宛在加入欧盟之后,里斯本战略的目标更被用于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合法化依据上。里斯本战略的目标以及为创建欧洲研究区域服务、增加立陶宛高等教育的竞争力等取向在政策讨论中变得更加明确清晰。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其进行的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立陶宛高等教育系统不具有与他

国进行竞争的结论，立陶宛为此十分担忧。利用加入欧盟后的欧洲结构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funds）的要求不断加剧，此举可以为大学提供新资源。结果大量新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正的需求，但确实使得学校能够招募更多的雇员、获取更多的运行经费。有些钱被用于提高单位负责人或其他学科带头人及教授的薪水。然而，欧洲结构基金中的部分资金对升级更新必要的研究设备和基础设施、促进国际合作或帮助学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建立自己的评价机制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 改革步骤

立陶宛科学与教育部已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06~2010）》。由于意识到本国高等教育系统存在某种程度的效率低下问题，2007年3月立陶宛科学与教育部创建了高等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工作组。右翼政党强烈要求进行高等教育系统改革，以促进高

等教育系统的自由化发展，而左翼政党则要求确保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发生改变。因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被邀请到一起分享对方的观点，并提出了一项改革立陶宛以往一直很封闭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系统的计划。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的质量、治理、财政、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

### 结论

因为优先考虑高等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最近有关改革的讨论明显带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对高等教育提升立陶宛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注比以前高得多，这与里斯本战略提出的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的目标是相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里斯本目标已经代替博洛尼亚进程，成为立陶宛高等教育改革的合法化依据。要对这次改革是否成功下断言还为时过早，但是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大范围改革的愿景，增加了人们对立陶宛高等教育将会出现更加彻底改革的希望。

## 德国的“卓越计划”

Daniel Fallon

德国“卓越计划”战略委员会委员

电子邮箱: df@carnegie.org

虽然许多因素造成了德国大学在 20 世纪后期的不佳表现,但高校的使命缺乏分化是最关键的因素。在教学和科研上,所有的大学被给予同等地位,大致上具有同等的薪酬标准和工作条件。2008 年,德国 88 所公立大学被授权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在这些大学中,每一所都可以声称自己是美国所谓的研究型大学。相对于德国的经济规模,这样的数量过于庞大,难以保证它们的高水平。事实上,从国际排名来看,没有一所德国大学位居世界顶尖大学之列。

2004 年 1 月 27 日,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社会民主党政府中负责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的部长布尔曼(Eedelgard Buhlmann)提议政府只遴选并支持 6 所大学成为德国的顶尖大学,这震惊了学术界。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内就达成了实行被称为“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的一致意见,并提供 19 亿欧元的拨款,其中 75%由联邦政府提供,25%由州政府负责提供。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员也被由基督教民主党员默克尔(Angela Merkel)所领导的大联盟所取代。负责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新部长——基督教民主党员沙凡(Annette Schavan)很快就认可“卓越计划”继续进行。

### 竞争的形式

在达成共识所必需的妥协中,计划的重心从仅关注确定几所精英大学转变为一个范围更广的项目,以在大学中加强科研并改革博士生教育。“卓越计划”包括三方面的竞争。第一是竞争新的“研究生院”,旨在发展现代化的博士生培养方式。胜出者将连续 5 年获得每年约 100 万欧元的经费,预计将有 40 个名额。第二是竞争“卓越集群(excellence

clusters)”,鼓励在一所大学内以创新的方式联合最强的学术项目,以开展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胜出者将连续 5 年获得每年约 650 万欧元的经费,预计设置 30 个名额。

最后一项竞争是“未来发展构想(futures concept)”,旨在从根本上重组大学以使其能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大学。为获得参加竞争的资格,大学必须独立地获得至少一个“研究生院”和一个“卓越集群”。胜出者将连续 5 年获得每年约 1,400 万欧元的经费,预计设置 10 个名额。因为在“未来发展构想”竞争中胜出的大学还将获得“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项目的经费,所以实际获得的总经费是连续 5 年每年至少 2,150 万欧元。所有的大学都可以拥有一个以上的“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通过“卓越计划”提供的经费是在大学常规预算之外增加的补充资金。

### 遴选过程

竞争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措词非常谨慎,避免使用“精英”或“最好”之类的词语,但是媒体和大众却很快地运用起这些词语,以至那些在“未来发展构想”竞争中的胜出者被广泛地称为德国精英大学。德国研究学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和科学理事会(the Wissenschaftsrat)建立了严格的竞争标准。由全世界国际著名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评估所有的计划书,每份提交的计划书必须用英语撰写,采用这一语言是考虑到国际评估委员会的情况。我很荣幸能成为由 12 人组成的战略委员会中的一员,负责评估“未来发展构想”并筛选出胜出的计划书。还有一个由 14 名成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并最后决定“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竞争中的胜出者。委员会内部的讨论非常激烈,坚决只关注学术卓越这一标准。

在美国,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评审小组的人或在杰出科研机构担任教师晋升和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成员的人,都会明白评审中需要怎样的深思熟虑。在对最终的推荐名单达成共识之前,战略委员会的每个决定都必须由专家委员会审查通过,反之亦然。在两个委员会都完成他们的工作之后,德国16个州的教育长官和联邦教育部长一起参加最后的会议,批准最后的名单。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决定都不能取代学术决定。

一个由杰出的国际学者组成、由战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担任组长的专家组将对“未来发展构想”计划的入围学校进行为期三天的现场考察。例如,由我担任组长的一个现场考察组包括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一位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一位印第安纳大学的院长、一位哥廷根大学年轻的获奖科学家、一位瑞士大学的前校长以及两位德国独立科实验室的主任。

## 结果

为了控制现金流量,2006年10月产生了约一半的胜出者,2007年10月产生了剩下的一半。在“研究生院”的竞争中,共收到253份计划书,83个入围者,39个胜出者;在“卓越集群”的竞争中,共收到280份计划书,81个入围者,37个胜出者。在“未来发展构想”的竞争中,有47所大学递交计划书、18所大学入围、9所大学胜出,分别为: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University of Karlsruhe)、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

对现在和未来需求的敏锐思考,造就了“卓越计划”这样的开创性举动。在所有的竞争中,都鼓励在计划中与当地伙伴(尤其是商业和工业上的伙伴)开展合作,强调跨学科研究与教学,注重为将来的学术领域营造一种积极的影响,以及把研究结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计划。除了已有的公认的优秀学

者与科学家,计划还必须为年轻教师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创造新的方式对年轻教师进行科研训练,并鼓励女性的参与和发展。最后,计划还强调非传统的理念,要求必须具有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高效的管理方式的设计。

## 目前的挑战

在打破大学完全平等这一类的禁忌、推动对高等教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进行广泛讨论以及把大学事务提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等方面,“卓越计划”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该计划也遇到了体制上的挑战,导致大学追求真正卓越的行动面临重重问题。从国际标准来看,德国大学获得的经费不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低很多。在两级政府的财政支持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小,州政府负责教学(而非科研),联邦政府为科研(而非教学)提供大量经费。德国大学教师的教学负担高得惊人,所有大学都要求教授每学期讲教4门课,而生师比一般徘徊在50:1至100:1之间。由于许多文化和历史原因,德国人难以认同某些高校得到比其他高校更优越的待遇。英国认为最多能支持3所顶尖的大学(剑桥、伦敦和牛津),而瑞士只能支持1所大学(苏黎士)。德国不可能支持多达六所的大学,但国家内部的压力则是扩大而不是缩小真正卓越大学的数量。

## 展望未来

当目前的资金耗尽时,“卓越计划”的利益相关者正致力于以某种形式继续实施该计划。虽然未来的方案还没有确定,但是新一轮方案将不可能是现行计划的简单重复。学者和政治家正在共同研究如何做得最好。然而,一个结果现在是肯定的,那就是德国的大学已不再是2005年的样子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已经确定,它建立在大学使命分类的基础上,以严格的学术标准为参考。追求卓越所导致的使命分化的基础上。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清晰地浮现在许多参与“卓越计划”评估专家小组的国际专家的脑海中。德国的大学并不弱。尽管面临着可怕的障碍,但这些学校仍然异常地强大。



## 欧盟的大学与社会凝聚力

Michael Bastedo

美国密西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bastedo@umich.edu

随着越来越多敌对和激进的伊斯兰移民在欧洲各城市定居,欧洲的社会凝聚力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在近年来已成一种普遍的共识。仅2006年一年,就有4本重要的著作讨论日益严重的激进伊斯兰教的威胁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世界”的。在荷兰,两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梵高(Theo van Gogh)和佛图恩(Pim Fortuyn)被谋杀的事件,作为案例尤为凸显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欧洲的疯狂行径。

欧洲国家如何建立制度化机制以提高穆斯林移民、特别是其子女的融入程度,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这些移民常常感到自己处在差异悬殊的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因此,利用各国的国家项目和资源(大学也包括在内)来增加社会凝聚力,已成为欧盟的一个目标。但是欧洲大学把社会凝聚力目标看作是正当的并加以落实的可能性如何呢?

### 大学的社会凝聚力

为了调查欧洲大陆的大学实施欧盟社会凝聚力目标的可能性,我对荷兰的一些大学教师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调查研究。讨论的问题包括,大学是否应该对穆斯林学生采取特殊的入学政策?课程体系中是否应该加入与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相关的主题?一所大学是否应该通过招聘、演讲或学校访问等方式,直接深入到穆斯林社会?

除少数例外,大部分教师们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漠不关心,甚至是公开敌对的态度。他们认为大学不可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任何统一的行动。“你不明白”,一位老师边摇头边对我说,“在这里,管理部门不会做任何事情”。

对于很多人而言,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表明我是个极其幼稚的美国人,对大学在欧洲

大陆如何运作一无所知。我会经常性地听到简短的教育,告诉我学术权力在各学院是如何被分散的,这与美国研究型大学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就是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吗?”一位教职人员曾这样问。被调查者认为大学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力的统一行动。

教师们已经认识到了有关移民学生的公平和政策问题上的复杂性,但是没有看到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即使他们承认移民的学生不太可能具有获得成功的条件或经济资源,但他们仍然否认开放式招生政策存在任何问题。一位老师说道,“这是学校、也许是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我不太确定”。另一位教师直接反对为鼓励穆斯林学生入学而设立任何奖学金。“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我不得不找一种方法来完成研究生学业”,他说,“我没有发觉有什么东西使这些学生与众不同”。

尽管我先入为主地认为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通过大学和教育者的介入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教师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融入欧洲社会归为政治问题。这样是有问题的。虽然在实践中有许多教师个人高度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但大学对任何政治问题采取行动都被认为是完全不正当的。

一位被访谈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所参加的、在美国召开的某学术会议上的事件。他介入到一场激烈的争论,即该协会是否应该采取赞成同性恋结婚的立场,问题的起因在于美国最近颁布了一项阻挠联邦政府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法律。这个讨论让他惊呆了。“学术界介入这类事件的想法太荒唐了!”他感慨地说。当我暗示学术界可能正设法向公共辩论提供专业性知识时,他在中途就打断了我,“不,不,不!”他几乎喊了起来,“这

纯粹是政治的!”。

### 自下而上地反思社会凝聚力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严厉地批评教师们抵制社会凝聚力政策，而是要找出外部治理政策实施中的主要文化障碍。欧盟的社会凝聚力政策丝毫不注意政策实施的主要绊脚石，这一点似乎颇为天真。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自上而下提高社会凝聚力的方法似乎不可能取得成功。相反，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地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移民学生经常缺乏社会资本，即那些通过社会网络内的各种关系而提供的资源。社会资本对学术成就有重要的影响。欧洲的大学需要通过招生和保持学生在学的努力，提高穆斯林学生获得本科文凭的比例；促进学生团体的建立，包括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这将促进学生之间的团结。

为那些旨在解决刚刚出现的移民和融入欧洲社会问题的研究计划和教育项目提供经

费，是提高我们对于这些社会挑战的意识以及重视这些挑战的另一种方法。应该邀请著名学者在学校里和公开场合就这些问题发表公开的演讲。事实上，在支持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公开辩论积极参与社会问题方面，荷兰的大学是个典范。

上述建议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被证明是可行的，也可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但最基本的理念是通过在学生和教师中间建立能产生社会利益的社会网络，把从上到下思考社会凝聚力的常规想法反过来。有效的治理不能依靠一种英雄主义的模式，即个人勇敢地反对社会规范、推动计划前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支持社会目标且更加实际的治理模式。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今年即将在《比较教育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第38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压缩版。

## 毛入学率、完学率、获得率：美国的表现

Arthur M. Hauptman

高等教育财政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art.hauptman@yahoo.com

在忽视国际比较多年之后，美国最近的若干报告都对美国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同经合组织内其他国家的表现进行了对比。这些报告主要关注美国高等教育获得率如何每况愈下的问题，但同时也常常对美国在毛入学率和完学率方面的地位提出质疑。

### 毛入学率 (participation rates)

毛入学率指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与传统的适龄人口之比。几十年来，毛入学率已成为比较各国表现时的通用指标。马丁·特罗 (Martin Trow) 通过确定不同的毛入学率，建立了当代著名的精英、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体系理论。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便被公认居世界首位。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 2/3 以上的春季高中毕业生将在同年秋季入学接受高等教育，远远高于 70 年代初期的水平，当时的毛入学率不到 50%。

但是由于对美国入学率 (entry rates) 的界定有差异，美国这种高水平的毛入学率并未在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得到反映。经合组织计算入学率的主要方式是使用在校生数 (包括国际留学生和超龄学生) 除以传统的大学适龄人口，因此在那些有大量留学生或超龄学生的国家往往会出现高估入学率的情况。这便是新西兰在有些年份出现入学率高于 100% 的原因，其 2005 年的入学率为 79%。同年美国的入学率为 64%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 9)，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54%。但是近年来，美国的入学率有时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上述毛入学率计算方式难以反应现实情况的又一证明。

### 完学率 (persistence rates)

另一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进行比较的传统方式是完学率，即入学学生完成学业的比例。对美国大学生的纵向周期调查表明，大约一半的学生在六年之内取得学位。对就读于社区学院的学生来说，获得学位的比例则低得多，肯定不到 20%，有可能还低于 10%，因为很多社区学院的在校生并没有打算获得学位。有人认为，美国在完学率方面往往低于其他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的国家之一，所坚持的政策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尝试接受高等教育，而对有多少人完成学业不太担心。

但就像入学率一样，经合组织收集数据的方式和公布的完学率数据可能不利于进行比较。经合组织公布两种完学率。一种是存活率 (survival rates)，用一年内获得学位的学生数除以常规入学年度中的新生数 (考虑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根据这种衡量标准，美国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最后，与新西兰的 54% 并列。另一种统计完学率的指标是毕业率 (graduation rates)，即用一年内的毕业生数除以常规毕业年龄的在校生数。2005 年美国的毕业率为 34%，低于经合组织 36% 的平均水平，但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的水平。有趣的是，新西兰的毕业率为 51%，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水平。这些差异表明了为什么不能简单地依据经合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可能是，美国的完学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平均或偏下水平，但并不处在最后。

## 获得率 (attainment rates)

对入学率和完学率进行国际对比的传统近期发生了改变, 获得率——成年人中具有高等教育学位的比例, 成为比较的主要指标。这一转变受欢迎的原因如下: 第一, 获得率能同时衡量入学率和完学率, 因此可能优于单纯衡量入学率和完学率的指标。第二, 作为人口普查的一部分, 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都采用统一口径测量获得率, 因此是一种比入学率和完学率的近似测量更合理的统计。第三, 获得率还具有预测未来趋势这一独特的特征, 即使所收集的是瞬时数据, 也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年龄的成年劳动者的获得率得以实现。

在美国, 这一转变, 即对获得率的关注, 引起了对美国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地位的持续争论。近期的几份报告认为, 美国的获得率正在下降, 其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地位已不如从前。这些报告同时也表达了它们的担忧: 如果美国在政策上没有重大改变, 以及/或在公共经费上没有显著增长, 美国将逐渐失去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的能力, 因为其他国家将培养更多的大学毕业生。

在美国, 获得学位实际上包括两种, 一种是学士学位, 另一种是副学士学位 (subbachelor's degrees), 如由社区学院颁发的协士学位 (associate degree)。就授予的学士学位来讲, 美国多年来一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首位, 这种趋势还将继续。美国与挪威所有成年劳动者中具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一样 (30%), 并列第一。但当比较最年轻的成年劳动者获得学士学位的情况时, 若干经合组织国家现在的情况都比美国好, 因为它们的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快速发展, 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发展成熟并达到均衡点。

对美国高等教育获得率更大的担忧是在副学士学位方面, 美国一直以来就落后于其他许多经合组织国家, 这个情况还将继续, 美国获得副学士学位的比例为 9%, 刚好达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综合考虑学士学位和副学士学位获得率时, 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根据这种方式, 当计算最年轻的成年劳动者的获得率时, 美国仅仅排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第 10 名。

在近期的这些报告中, 还提到美国和德国是仅有的两个其年轻劳动者的获得率等于或低于年老劳动者的获得率的经合组织国家, 这表明两个国家的获得率正在下降。但这种对年轻和年老劳动者的学位获得率进行对比也可能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事实上, 过去的几十年中, 美国的学士学位获得率在稳步上升。如果年轻和年老劳动者具有同样的学位获得率, 获得率怎么会上升呢? 答案在于, 如果他们具有同样的获得率, 那么全国的获得率很有可能是上升的。原因在于, 年轻劳动者的学位获得率将比年老劳动者的高, 随着现在的年轻劳动者一天天变老, 将会有其他的一批年轻人获得学位, 这样便会导致获得率上升。

总之, 美国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继续具有最高的入学率, 低于平均水平的完学率, 最高的学士学位获得率, 以及处于平均水平或偏下的副学士学位获得率。这些排名并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美国很大一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但很多人都没有获得学位。因为有如此多的在校生, 至少学士学位的获得量是高的。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 美国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提高其社区学院学生的完学率。

## 高等教育政治经济中的营利性大学

Brian Pusser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bp6n@virginia.edu

在过去的20年里,高等教育研究将大量注意力转向研究各类高校的目的和效用。在美国,长期以非营利性公立和私立学位授予机构为主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最近不得不把一些注意力投向了较为引人注目的营利性高校。虽然其在校生只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但与这些营利性高校的规模可能让人想到的影响相比,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政治经济中的实际影响却大得多,尤其是公开上市的营利性高校,如凤凰城大学。在对《高等教育法》进行修订的协商过程中,营利性大学和它们的游说组织在制定影响所有高校的政策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些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和许多已有或打算举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 营利、市场和政府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改革所秉持的信念很简单,即政府应减少在公共和私人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以利于开展各种可能的市场竞争。为了评价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高校可能产生的影响,学者们将高等教育的复杂本性概括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并讨论了政府在信息不对称、道德危害、投资不足等教育市场所存在问题中发挥的传统作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混合制度,包括政府对公共非营利性高校大量的直接拨款,以及政府对公共非营利性高校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对私立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高校的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学生的资助和税收政策)。这一体系在州和联邦政府层面都受到严格监管。

把政府的直接补贴改为更具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体制的政治主张认为,基本的公共利

益能够通过旨在塑造市场行为的监管措施得以保护。这是个强有力的主张,问题是国家需要监管什么,以及监管的效果将如何。虽然现在有一些共识,即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成功,各州需要采取监管措施来确保公共和私人产品之间的适当平衡,但就监管的形式和平衡的性质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如何能够有效地监管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个大难题。授学位的营利性大学的出现,为洞悉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 政治舞台上的大学

尽管并不总是被描述成那样,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都是政治机构。在一个由政治行为决定的过程中,这些机构需要相当多的公共成本,分配着基本的公共收益。美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监管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州和联邦政府政治结构中对各方面需求的裁定来解决的。这一分配方式有力地激励着高校在政治过程中明确自己的利益。

游说是政治行为中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即在处于一定地位的立法者或个人改变立法之前,投入人力和财力去提出问题、提供信息和建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因为公立和私立的非营利性高校都试图从美国国会争取“特殊(earmarked)”经费,美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游说显著增加。通过雇用游说者、借助协会的力量,非营利和营利性高校都在各自努力影响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立法,同私人助学贷款提供商和其他从事教育相关产业者的行为如出一辙。

### 营利性高校的游说

在游说这个舞台上,营利性高校具有优

于非营利性高校的许多结构优势。营利性高校可以为立法者和政党提供直接的政治捐款。事实上，负责有关高等教育立法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导人已经从营利性高校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那里获得了重要的支持。由于关注点相对较少，许多营利性高校很容易做到仅以获取某些特殊资源为主要目标。非营利机构试图利用政治支持来使各种公共和私人产品最大化，而私立高校游说的最终目标则是影响立法以使利润最大化。

如前所述，美国营利性高校在《高等教育法》修订过程中极其活跃，试图影响有关高校获得补助的资格、远程教育以及学分转换标准化方面的联邦法规。营利性高校在州政府层面的游说也很积极。据《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报道，在加州立法机关最近的一次会议期间，营利

性大学花费了近50万美元。这些努力对现有政策带来了许多挑战，将可能在新的法案中体现。即使只有约6%的美国大学生就读于营利性大学，但这些学校在高等教育的游说舞台上已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 结论

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能保护高等教育公共和私人利益的属性，又能满足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市场的营利需求的政策？与大部分的政治竞争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种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政治舞台的能力。把注意力转到营利性高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合法性、游说和政策挑战之间的平衡问题，将有益于有关政府与市场之间紧张关系的研究。

## 知识经济：新加坡的个案

Ravinder Sidhu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育学院

电子邮箱: r.sidhu@uq.edu.au

新加坡以其经济发展上的远见卓识而著称，制定了建设创新型和高附加值型知识经济的规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加强了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此后，新加坡把大量资源用于把本国转变为一个教育和医疗服务枢纽的建设上。虽然新加坡对知识经济的渴望并不是特别与众不同，罗马尼亚、爱尔兰、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类似的目标，但新加坡一心一意追求这些目标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

### 环球校园计划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环球校园计划(Global Schoolhouse)，包括三大支柱性措施：为“世界一流大学”在新加坡建立分支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到2015年吸引15万留学生到新加坡私立和国立大学求学；改造新加坡的各级教育。环球校园计划与教育、科研、城市重建、税收、移民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政策改革是齐头并进的。

邀请外国世界一流大学到新加坡的政策战略在于利用这些大学的“品牌资产”。最初邀请的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其中包括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乔治亚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到新加坡开设研究生层次的教育项目，资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新加坡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及提供博士生教育，协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一座重新翻修的历史建筑中建立分校，与沃顿商学院签订协议、合作创建新加坡的第三所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被邀请的学校现在已经扩展到美国之外的那些侧重于技术和创新学科的高校，比如巴黎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新加坡建立了实体校园，印度的贾殷管理学院(Indian Jain School of Management)也建立了实体校园。纽约大学艺术学院2007年开始在新加坡教学。

引进国外的专业知识为新加坡的知识经济建设做贡献，与早期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政策产生了共鸣。政府“付出就会有回报”(build it and they will come)的理念，被落实在了现代化设施、税收优惠以及为外企提供专项资金上。在新独立的国家对资本主义深表怀疑的时代，上述措施使新加坡建立了关键产业，并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中去。新加坡总理指出，新加坡人从外企“学会如何做事”，以别的方式他们未必能学得到这些。他不太考虑“我们是否受到剥削”这一问题。

新加坡期望世界一流大学与新加坡的大学、新建的科研机构合作创建一个“自我维持型的科研生态系统”。政府已经划出80亿美元用于2006-2010年的研发活动。投资6亿美元的“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校园”(Campus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计划正在进行中。

教师参与环球校园计划的现实给新加坡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挑战。由于学校历史、任务和研究经历的差异，跨越到研究型文化中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加坡大学的建校时间不长，其主要精力集中在提供高水平的本科教育上。因此，在与政府指导学校运营程度最低的麻省理工学院等全球知名高校开展科研合作时，这些大学面临着挑战。在政府密切控制大学的制约下，新加坡的教师们不得不与现实的和想象的全球卓越标准进行基准比较，完成学生入学机会和教育质量的目标。

在环球校园计划实施了近10年之后，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关闭了其新加坡研究所，另一个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决定关闭其新加坡分校。实质性的跨国科研合作非常昂贵，需要教师的奉献和投入。

## 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极权主义的国家

即使新加坡缺乏自由民主，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参与环球校园计划的绝大多数外籍知识工作者的专业自由。相反，新加坡提供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管理中所没有的学术自由，比如美国对干细胞研究的限制。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面临着苛刻的财政政策和竞争环境，与之相比，新加坡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则被认为处于更加宽松的经费环境中。政府提供资源和机会鼓励研究机构和大学少做管理、多做科研，包括开展不受短期商业利益影响的前瞻性科学研究。外籍教师也对有前瞻性和科学素养的新加坡领导者所提供的职业自由表示赞赏，这些领导者注重智力成就与城市环境的安全。尽管在民主自由方面对本国公民有限制，但新加坡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极权国家。新加坡被认为是一个管理良好，在

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再分配等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成就斐然的国家，超过其邻国的水平。

## 价值体系

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策试图躲开跨国公司、保护民族产业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与这些较保守的经济民族主义国家不同，新加坡坚持利用外国公司、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本国的关键知识产业并利用知识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

新加坡的知识经济计划要求本国公民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己、自力更生，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出国寻找机会，而不是希望政府为其就业负责。处于“第一世界”的地位也使新加坡人具有与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中国）一致的地理政治认同感。重要的是，确实是这种地理政治认同感把新加坡人从心理上与他们的东南亚邻居们区分开来。



## 肯尼亚的政治、种族与大学使命

Wycliffe Otieno

肯雅塔大学 (Kenya University) 教育管理系

电子邮箱: wotieno@e-parse.or.ke

在 2007 年肯尼亚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爆发了暴力行为, 教育在面对政治不稳定时的脆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清晰可见。大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 经常被视为孕育激进的政治理念和学生激进主义的根据地; 而在肯尼亚, 则是选举后的暴力行为直接以一种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了大学教育。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危机, 第一次表现出清晰的种族主义形式。

因为大学坐落在某些特定族裔占统治地位的地方, 被发现属于其他族裔的教授亲眼目睹了家园被烧毁的情景, 他们自己被驱逐或被迫逃亡, 事业被摧毁。由于害怕学生因支持某一族裔而使情况恶化, 学校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国家非常担心这类可怕的情况发生; 然而, 国家也希望学校开放以证明政局恢复正常。因此, 那些选择开学的大学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预防暴力行为的发生。

处于一片混乱的肯雅塔大学——该国规模第二的大学, 决定通过采取预防学生动乱和教职工骚乱的措施来开放学校。这些措施包括召开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的联席会议; 暂时禁止聚会和集会; 为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学生和教职员提供咨询服务; 与当地举行会谈, 以保证居住于当地的学生不受其他族裔的敌视; 放弃学生入学前必须交纳全部费用的规定。其他大学, 如马塞诺大学 (Maseno University), 则延迟四个月开学, 比一个完整学期的时间还长。内罗毕大学 (University of Nairobi) 比预期晚一个月开学, 但又因为学生之间的种族紧张而差点被关闭。

大学应对危机的措施可以从对肯尼亚特别有意义的大学使命这个角度进行评价, 大学的使命包括促进多样性和/或普适性、支持学术自由。这些问题都被铭记在肯尼亚宪法

和教育理念之中。

### 大学的普适性和种族问题

大学教育在本质和组成上来说“普适”的。虽然大学不可能完全超越国家这个概念, 但它仍然是一个超国家机构。提高民族凝聚力是肯尼亚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有关肯尼亚选举后暴力的一些报道 (例如, [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 把肯雅塔大学校区的重新开放作为多样性的一个经验进行了赞扬。而另一些不客观的报道则未能指出, 典型公众行为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力量是与大学的使命截然相反的高度政治化和种族化的官僚体制的衍生物。《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的报道并没有意识到公立大学和当今政治领导层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系。尽管有 2003 年进行的改革, 但肯尼亚的校长仍然由政府任命, 因而自然依旧保持着政治顺从。

这种政治顺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学管理继续种族化, 学校内关键岗位的人员任命仍从同一个族裔和地区内选择。种族联系在两边同样起作用: 政治庇护人找到回报其支持者的途径, 而管理者也可以在其族裔内培养许多忠诚的学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只要有忠诚的追随者, 在操纵大学校务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时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控制主要的管理层只是遏制或安抚内部反对派的一种方式, 高级管理层还需要控制学生的活动。他们再一次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通过施加影响, 把特定族裔的学生选举成学生领袖。一些公立大学已公开试图从某些特定的族裔中选举学生领袖。然而, 由于大学的管理层已经种族化, 这个事情现在更加棘手。2007 年在一所大学里, 这种努力出现了意外后果, 十几个其他族裔的学生联合起来

投票反对学校所偏向的候选人。结果导致学生领袖的族裔组成在某一特定大学与该大学的管理层的族裔组成差异巨大。大学管理层对多样性的反对非常显而易见。2006年某大学教师罢工发生后被解雇的讲师情况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事实上，被解雇的讲师中没有一个是来自特定族裔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因此，这一讲师解雇行为被广泛地谴责为种族解雇。聘用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种族影响。

### 学术自由

肯雅塔大学遏制可能的种族问题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限制某些学科的教师讲授某些主题或举特定的例子，这显然是压制学术自由。同样地，禁止集会（即使只是暂时的），也是一种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禁止这类集会的举动是虚伪的，因为当学生与大学管理

层来自于同一族裔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管理者和教师的办公室召开各类会议。学校里的许多其他事例可以进一步证明管理者的虚伪，比如工作人员被警告不能使用其母语。全国人民都知道某一族裔一直在使用其母语。

很显然，大学采取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就是收买人心。肯雅塔大学以通常坚持学生在入学前必须交纳全部的费用而著称，但是这一次法学院的学生已经得到豁免。学生因此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暂缓交纳费用，其中大部分人都面临着经济困难。就像肯雅塔大学的案例一样，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是安抚学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不幸的是，对肯雅塔大学来说，一旦恢复正常开学，这项优惠政策就很可能被取消。这可能将给学校带来更多的麻烦。

## 新书简介

**Barblan, Andris, Ustun Ergruder, and Kemal Gürüz. *Higher Education in Turkey: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Bologna, Italy: Bonon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3 pp. (pb). ISBN 978-88-7395-341-8. Web site: [www.buponline.com](http://www.buponline.com).

该书对土耳其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分析,两位土耳其高等教育专家还提出了对高等教育进行组织改革的相关建议。

**Bousquet, Marc. *How the University Work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ow-Wage N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0 pp. \$22 (pb). ISBN 978-0-8147-9975-8. Web site: [www.nyupress.org](http://www.nyupress.org).

该书详细分析了教师工会化、美国处于学术等级底端的兼职教师和其他教师面临的问题、学生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组建自己工会的努力,作者对这些主题的论述是有失偏颇的。尽管如此,该书仍然是极少数讨论美国高校广大专业人士所面临问题的著作之一。

**Buller, Jeffrey L. *The Essential Academic Dean: A Practical Guide to College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7. 431 pp. \$30 (pb). ISBN 978-0-470-18086-0.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http://www.josseybass.com).

基于美国的视角,该书对学院院长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院长,作者探讨了院长的作用并提出一些获得成功的实用建议。讨论的主题包括院长的素质组成、院长的助理、领导力、

职业路径等。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Selected Themes*.** Pretoria, South Africa: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 2007. 188 pp. (pb). ISBN 978-1-919856-61-2. Web site: [www.che.ac.za](http://www.che.ac.za).

该书对南非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对关键部分进行了研究分析。书中分析的主题包括公共经费拨款及其所引发的问题、信息与通信技术、学校治理与公共问责、校园文化、成年学生的入学问题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变革问题。

**De Wit, Hans, Pawan Agarwal, Mohsen Elmahdy Said, Molatlhegi T. Sehoole, and Muhammed Sirozi, eds.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Circul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08. 266 pp. \$49 (pb). ISBN 978-90-8790-258-2.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书是第一本主要分析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动问题的著作。书中研究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南非的个案,对全球学生流动进行了总体思考,对欧盟博洛尼亚进程和里斯本战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Epstein, Debbie, Rebecca Boden, Rosemary Deem, Fazal Rizvi, and Susan Wright, eds.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Geometries of Power: Framing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395 pp. (hb). ISBN 978-0-415-9637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作为2008年的《世界教育年鉴》，该书的关注点在于高等教育。书中按国别对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讨论的主题有国际化、学生和教师的跨国学术流动、私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学术领导等。

**Gürüz, Kemal. *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335 pp. \$75 (hb). ISBN 978-0-7914-7413-6.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该书对支撑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经济力量、营利性高校的兴起、信息技术等。该书将这些因素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生流动联系在一起。虽然是土耳其的一名科研工作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但作者从全球视角出发来谈论这些问题。

**Educación Superior en Iberoamérica. Informe 2007.** [Higher Education in Ibero-America. 2007 Report] Santiago, Chile: CINDA, Centro Interuniversitario de Desarrollo, Santa Magdalena 75, Piso 11, Providencia, Santiago, Chile. Web site: www.cinda.cl. ISBN 978-956-7106-50-9.

该书以智利校际发展中心（Chilean Center Interuniversity Development）协调开展的、由各国学者负责撰写的13个拉美国家和2个欧洲国家的报告为基础，包括一个序言和八章内容。探讨的主题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地区（Ibero-American）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机会问题、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大学在研发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财政、大学的治理和管理、质量保证等。每

一章都包括对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与出于比较目的而选择的其他5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所进行的宏观比较，若干国别报告，以及其他信息资源的简要介绍。

**Kramer, Gary L, and Associates. *Fostering Student Success in the Campus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7. 458 pp. \$45 (hb). ISBN 978-1-933371-24-5.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该书是从研究角度出发的应用性著作，对如何提高美国高等教育中学生取得成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的主题包括沟通对学生的期望、提供足够的学生服务、通过确保学生服务和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关注来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支撑性服务以留住更多学生等。

**Magna Charta Observatory.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Integrity*.** Bologna, Italy: Bonon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7 pp. (pb). Web site: www.buonline.com. ISBN 978-88-7395-319-7.

该书包括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中腐败和渎职问题的论文，讨论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埃及的个案研究。该书是大宪章观察组织（Magna Charta Observatory）一系列分析丛书的一本，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改善高等教育的欧洲机构。

**Musselin, Christine. *Les universitaires*.** Paris: Editions La Decouverte, 2008. 119 pp. (pb). Web site: www.collectionreperes.com. ISBN 978-2-7071-5060-8.

该书对现有的关于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学者是什么人？他们如何工作？他们如何步入学术职业以及他们潜在的职业发展是

什么? 学术劳动力市场在不同国家如何运作?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代表三种不同学术传统的三个国家(法国、德国、美国)的情况。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igher Education in Kazakhstan.* Paris: OECD, 2007. 222 pp. (pb). ISBN: 978-92-64-03316-0. Web site: [www.oecd.org/publishing](http://www.oecd.org/publishing).

作为高等教育系列评论的一部分, 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书提供了有关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的可靠数据, 并对财政、劳动力市场、国际化、治理以及质量等主题进行了评价。

**Savicki, Victor, ed.**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erndon, VA: Stylus, 2008. 375 pp. \$29.95 (pb). ISBN 978-1579222666.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http://www.styluspub.com).

跨文化教育研究旨在改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者的交流与接触。该书重点关注美国的出国留学项目以及与美国有关的国际学生, 并分析了跨文化经历的改善问题。该书还对特定项目进行了个案研究和广泛讨论。

**Sharma, Kavit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Aspect of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Delhi, India: Gyan Books, 2008. 202 pp. Rs. 500 (hb). ISBN 978-81-212-1006-5. Web site: [ww.gyanbooks.com](http://ww.gyanbooks.com).

印度的高等教育日益关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该书探讨了印度是如何参与国际化的。

**Smith, Wilson, and Thomas Bender, e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ed: 1940-2005.*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521 pp. \$80 (hb). ISBN 978-0-8018-8671-3.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该书从历时和即时的角度, 精心收集了自1940年以来许多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件, 并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涉及的主题包括课程、人文学科、学术职业、学科、学生权利、学术管理等。编者选择了部分文件、章节和论文来阐明一些重要的主题。

**Tiwari, Shubha, ed.** *Education in India. Vol. 4.* New Delhi: Atlantic, 2007. 292 pp. Rs. 550 (hb). ISBN 978-81-269-0850-9. Web site: [www.atlanticbooks.com](http://www.atlanticbooks.com).

该书是一本论文集, 由一系列关注印度高等教育的论文组成, 探讨的主题有: 印度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作用、师生关系、教师教育、学术评估、性别差异等。

**UNESCO Forum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Knowledge.** *The Con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Current Challenges for Africa.* Accra, Ghana: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2007. 95 pp. (pb). ISBN 978-9988-589-38-7. Web site: [www.aau.org](http://www.aau.org).

该书是一本论文集,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大学如何能够与教育系统建立关系, 主要关注非洲的情况。个案研究包括: 斯威士兰的非正式教育、马拉威的中学教师培训、马达加斯加的教育改善。

**Vest, Charles M.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from World War II to World Wide Web: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Emerging Meta-Univers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40 pp. \$24.95 (hb). ISBN 978-0-520-25253-0.**

麻省理工学院前任校长查理斯·威斯特 (Charles Vest) 对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诸多重要挑战进行了探讨。该书以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为基础, 讨论的问题涉及基础研究面临的挑战、与科技有关的问题等。他对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项目的讨论尤为有趣。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1, No. 3, September, 2008

#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2, Summer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 Global Issues

Costs and Benefits of "Open Access" Scholarship .....	1
Teaching in English: European Trends .....	3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Asia .....	5

##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Exploring Academic Salaries .....	7
Research Careers in Europe .....	9
Crisis of the American Academic Workforce.....	11

## Latin America

Is There a Latin American University Model?.....	13
Measur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Argentina .....	15

## Eastern European Reforms

Educational Reform in Montenegro.....	17
Lithuanian Reforms .....	19

## Western European Developments

Germany's "Excellence Initiative" .....	21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Dutch Example.....	23

## American Trends

Particip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25
For-Profi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	27

## Countries and Regions

Knowledge Economies: the Singapore Example .....	29
Politics, Ethnicity, and University Mission in Kenya .....	31

<b>New Publications</b> .....	33
-------------------------------	----